

辛亥革命展覽中的「東洋」

有關辛亥革命這一歷史題材的展覽層出不窮，這其中，「東洋」因素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不少展品直接或間接點出了當年的這場中國共和革命與東鄰日本之間的某種關聯。回眸這些展覽中的日本元素，則能夠對晚清中國的時局、後來歷史發展的脈絡甚至如何促進中日民間文化交流的持續深入，都有着較大的意義。畢竟，歷史往往不能夠定格在某一個時代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東洋的概念，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位置。在救亡和啟蒙合一的晚清中國，此二者往往代表着東洋概念的實在化、具體化。一方面，大量的留學生前往日本，試圖從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中尋找到適合中國自強的經驗；同時，日本不少的民間友人也積極參與了協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故而，這種雙向互動構成了辛亥革命時代的兩國民間交往。這些歷史事實，在不少展覽或展品中，是有着清晰反映的，也成為了時代的見證。

師法東洋的革命軍

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以留學生為主的革命軍，不少曾經有過在日本留學的經歷。隨着清末甲午戰爭的戰敗，清國留學生心中的尊嚴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而隨着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取得勝利，當時的留學生們更是認為，要想拯救國家免於外患和內部專制的威脅，則必須學習日本，將中國改造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化國家。有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參加清末改革，有的則索性參加了反對清政府的革命。

不能不提的是黃花崗起義。這次起義的幾位主要留學生骨幹林覺民等，都曾經留學過日本。當他們被清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

廷殺害、或有些被鎖拿逮捕之後，日本方面尤其是學界，發現革命軍中多數是留日學生，故而早稻田大學降下了半旗，為這些清國留學生默哀。孫中山為其親筆題寫的悼詞，更是充滿了深切的緬懷與悲傷。此外，孫中山與日本友人的友誼，也是一段值得銘記的佳話。澳門孫中山紀念館中，他與日本民間革命志士的合影，也成為見證歷史關鍵時刻的有力佐證。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梅屋莊吉。澳門孫中山紀念館、中山大學等地點的孫文雕像，便是梅屋莊吉個人出資建造然後捐贈給中國。如今，在廣州黃埔軍校陳列館，已經將梅屋莊吉與孫文的革命友誼故事，列為常展，供民眾參觀。

與民間友人以真誠持續參加中國的革命事業相比，當時的日本政府在這一問題的態度上，顯得較為複雜，甚至曾接受清政府的要求驅逐孫中山。而山田良政的犧牲，其實便與日本政府不支持惠州起義有着很大關聯。而日本新聞界，看待中國革命的視角也不盡一樣。例如，有些新聞媒體便將清國的革命運動看作是動亂，或許是為了新聞工作的需要，他們為此還標注出了地圖，從而使得觀察中國事態的視角更為直接和多元。這也說明，當時在日本，各階層、各種力量，都在以不同方式注視着中國內部的各種情形。

歷史迴響與啟示

中國的辛亥革命，與日本有着極大的關聯。當年日本民間友人對中國革命的幫助，成為了傳遞兩國民間友愛與情感的最為真實的寫照。支援中國革命的諸多日本友人及其後代，後來為了中日避免戰端以及戰後實現邦交、世代友好，均作出過巨大和積極

的貢獻。這一點，已經為歷史和兩國民眾所銘記。

如今，就單純從歷史角度而言，辛亥革命已經成為了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事件。這種影響，在國別關係的概念中，在文化思想的範疇中，則與東鄰日本的關係，顯得極為重要。辛亥革命時代，不少中國與日本民間友人所持有的興亞、亞洲主義思想，在後來的日本軍部法西斯掌權時期，成為了擴大和侵略中國的理論武器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不能不看作是歷史上一種巨大的異化和悲劇。故而，在辛亥革命的歷史回眸中，在甲午戰爭120載的情境下，如何於文化領域持續推動中日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如何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將是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梅屋莊吉贈送的孫文雕像



有關黃花崗起義的畫報



日本製作的辛亥革命火花



日本傳媒製作的反映中國革命的地圖

中國民間剪紙藝術 打開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窗口

據報道，坐落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寶鳳剪紙博物館一個月內將開門迎客。這座博物館的主人——中國著名剪紙藝術家、長春寶鳳剪紙藝術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寶鳳，此時正忙著為博物館做開門前最後的裝飾。

李寶鳳把剪紙藝術與中國國畫、西方油畫藝術結合在一起，保留了中國東北民間剪紙的樸素特色，技藝精湛，反映出中國民間的多彩生活。從上世紀末開始，李寶鳳帶著她的剪紙作品在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俄羅斯、朝鮮等國家進行展覽，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歡迎。

去年九月，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舉行的「吉林文化周」活動中，李寶鳳帶著三十餘幅作品進行展出，向外展示了中國民間的美好生活與美麗

景致，備受參觀者好評，這更堅定了她把中國民間剪紙藝術推向世界的信心。

在中國，像李寶鳳一樣致力於將剪紙藝術推向世界舞台的人還有很多。吉林省輝南縣撫民鎮，中國滿族剪紙藝術傳承人徐貴庫也讓不少外國朋友領略到了中國剪紙藝術的奇妙。

徐貴庫從事的滿族剪紙藝術是中國剪紙藝術的重要分支，展現了中國滿族人民的生活和習俗，作品獨具神秘的藝術氣息。在赴日本、韓國等地展出時，參觀者對這些剪紙作品無一例外給予好評。「接下來還要帶著作品到更多國家開展交流，讓世界上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徐貴庫說，這就是他的中國夢。

自中國剪紙藝術被列入「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這門古老的藝術煥發出更蓬勃的生命力，愈來愈多的海內外人士開始關注中國剪紙藝術的價值。剪紙成為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根據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喬曉光教授的研究，中國近三十個民族有關於剪紙的習俗傳統，中國剪紙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文化新大陸」。

在吉林省輝南縣輝發城鎮中心小學，剪紙藝術課程已經成為小學生的必修課。學校的走廊裡，掛滿了由學生和老師製作的剪紙藝術作品。「剪紙不僅能提升孩子的動手能力、交流和協作能力，而且對我們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也有幫助。」學校副校長陳立偉說。



香港作聯名家匯聚 分享華文文學傳播力量

由《明報月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香港作家聯會聯合主辦並由澳門大學、世界華文文學聯合會等機構聯合承辦的「華文文學在世界的傳播——第二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於5月18日起至5月22日在香港、兩地舉行。這場跨越兩岸四地的講座邀請了來自內地、台灣、乃至美國的知名作家、學者出席。包括內地王蒙、陳丹燕、台灣黃春明、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英譯者）等近二十人。

而成立26年的香港作家聯會，也藉此機會，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的知名作家學者與作聯監事、理事及會員們共聚一堂，以「文學與城市」為主題，舉行第二屆兩岸四地聯歡晚會，共同分享和探討華文文學在世界的傳播。作家王蒙、黃春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

曉明、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院劉年玲等多位嘉賓都進行了精彩發言。

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在致辭中表示，作聯的作家日益壯大，並廣泛邀請各地作家、傳媒人及文學評論人一起探討文學趨向，碰撞出文學創作的火花——就如作家劉再復曾在去年作聯成立25年之際指出「作聯多年的不易堅持，靠的只是對文學的信仰。」

文學不會消亡

年過八旬仍筆耕不輟的著名作家王蒙指出，在香港辦文學刊物可能並無內地那樣的財政支持，所以他更加敬重作聯成員在這種環境下對文學的貢獻。他說「如今網絡與信息技術的發展都造成了文學讀者的流失，讀小說和詩的人沒有讀手機的人多。相比之下，內地的狀況可能好一些，因為人口基數大，另外也會組織各式各樣鼓勵優秀文學的評獎活動，所以即使有人冷落文學，但還有人熱愛文學。」王蒙更強調，只要人還在用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記憶，文學就不會消亡。因為文學的符號意義很強，所以具有推動人的思維的能力。而對於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而言，沒有語言的發達，思維也不可能真正發達。

台灣著名作家黃春明則回顧了自己1966年從宜蘭鄉下去台北的經驗。他談到了「知識分子集中在城市」這一點對自己寫作起到的鼓勵作用。又因如今的生活模式是城市在影響鄉村，所以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也早已超出了城市範圍。「譬如城市人覺得某本文學作品好，舉

辦排行榜，那麼除城市人閱讀，鄉下人也會跟着讀。」他以個人經驗談到城市與文學的緊密關聯，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任何事物都商品化的浪潮也衝擊到文學，那麼這種城市與文學的關聯也會傷害了文學。「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共同想辦法，像我看到香港作聯這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一起出書辦雜誌，就很感動，因為文學的影響力就是這樣傳播開來。」文學批評家陳曉明則認為「文學與城市」實際上也是如今大陸文學創作和當代文學研究中面臨的一大難題。他說：「我們有很好的寫鄉土中國的作家，但寫城市卻一直不太成功。這個與20世紀的中國背景有很大關係，在表現城市時，我們的歷史是破碎殘缺的。」他更認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回到人性深處，並認為大陸部分作家寫城市是靠表現城市中對立的生存狀況，但這種方式是否最適切仍有待商榷。「可是表現城市在其他文明空間就可以實現，像電影那種視聽文明就沒問題，所以可能文學這種對中國來說像是農耕文明的方式，還有更寬廣的路要走。」



陳曉明、劉年玲、王蒙、潘耀明、陶然等作家(順序為從左至右)出席是次晚會。劉國權拍攝



王蒙先生活動上發言。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院劉年玲則在發言中特別強調了香港對她個人創作的意義。她說：「如果沒有香港的中國文學，如果沒有香港這座城市，我可能不會用中文去寫作。」作為華僑，她認為對像自己這種試圖表達對中國情感中立的創作者來說，香港給了她一個特殊的機會。深圳作家協會主席李蘭妮則特別強調了「文學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比較奢侈，但如果沒有文學，城市就會失去它的溫度。」嶺南大學客座教授在分享會即將結束之際，引用了魯迅的觀點「鄉土文學就是城市中人離開鄉下開始留戀鄉土從而產生出的一種文學體裁。」他指出，即使鄉土小說也是城市的產物，在文學創作的維度中，鄉土最終仍然離不開城市。

文：賈選凝 攝：劉國權